

爱在“银河”流淌

■许 鑫 夏雨萱



“脑子里的知识。”

多年后，王戟躺在重症监护室里，全身只有手指能动时，曾无数次想起这句话——脑子里的知识，谁也拿不走。只要大脑还能思考，双手还能敲击键盘，他就还是那个与代码赛跑的人。

20 世纪 80 年代初，计算机还是稀罕物。为了帮儿子选专业，刘桂枝特地去长沙“实地考察”了一番。回到家，她对王戟说：“咱们选软件。”

她做了一个比喻：“假设钢琴是硬件，曲子就是软件。美妙的乐曲，有无限的创作空间。”

母亲的建议像一座路标，为王戟锚定了一生的航向。他走进原国防科学技术大学，在高可信软件技术这个当时鲜有人涉足的领域深耕数十年。国产操作系统、高性能计算、信息安全……那些看不见的“乐曲”，在他和团队的手里，一首一首谱了出来，奏响在我国国防科技事业的宏大乐章里。

2013 年，王戟突发主动脉夹层。为了不让父母过度担惊受怕，学院领导和同事以善意的谎言隐瞒了二老。3 个月 后，直到王戟病情趋于稳定，母子俩才进行第一次通话。

这 3 个月里，王戟的妻子，同为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还是 2023 年度全国三八红旗手的黄春，始终守护着王戟。因为家中还有年幼的女儿，黄春只能白天在医院守候，夜里赶回去照顾女儿，第二天一早又出现在病房门口。邻居梁妍一家也主动帮忙接送孩子，并照看孩子起居。这份邻里守望，让黄春得以在陪伴丈夫和孩子的日子里，依然承担着新一代高性能计算机工程的使命。

当王戟虚弱的声音终于从听筒里传来，刘桂枝握紧话筒，千言万语在心头翻滚，最终只化作几句平静的话语：“儿子，身残志不残的人，多了去啦！如果你不能面对的话，别人只会叹息一声；这个孩子可惜了；如果你能够面对，大家都会帮你，推你一把！”

王戟说：“妈，我听您的。”与此同时，学院领导找到刘桂枝：“刘阿姨，您有什么要求，都可以提出来。”那天，她只提了一个要求：“如果王戟的手是好的，脑子是清楚的，我希望组织上给他一个好的工作环境。”

在她心里，王戟只要活下来，就不能一直躺在病床上。为他创造一方可

勇善战的战士，多次立功，并火线入党。然而，那位老班长却在抗美援朝胜利前夕的一场战斗中牺牲了。

部队回国后，父亲光荣退役，回到家乡小山村，成了一名普通农民。

父亲的一生，对子女要求特别严格。我们兄弟姐妹人生成长的重要一课，都来自父亲手中的旱烟杆。记得我刚上小学那一年，一次放学后，我与小伙伴们一起到老屋后山上放羊。把羊牵到山上时，我们几个人便被远处茅草丛中的一个野蜂窝吸引住了。几个无知无畏的少年立即投入到“围剿”野蜂的“战斗”中，原本手中牵羊的麻绳，早已丢弃在一边。待到“战斗”取得“全面胜利”，我们才发现羊群跑到我表叔家的庄稼地里，把一大片栽种不久的红薯苗啃食得精光。

回到家中，表叔已把我们的“罪状”告

到了父亲那里。父亲满脸怒气走到我跟前，抡起手中的旱烟杆便朝我小腿肚上打来，边打边说：“已经上学了还犯错，不打痛怎么能长记性？”

我长大后才慢慢明白，在父亲的认知里，上学读书的孩子就应该懂得对错。那次经历，成了我一生深刻的记忆。

父亲手中的旱烟杆，不仅是我们兄弟姐妹的记忆，也藏在我们那个小山村几十户人家的记忆中。

那时，我们村里若是有一家出现争执不睦的情况，都会有人急匆匆来我家中，请我父亲去劝解评理。每当这时候，父亲都会放下手中的活计，拿着他的旱烟杆前去调解。常听村里的人说胜利”，我们才发现羊群跑到我表叔家的庄稼地里，把一大片栽种不久的红薯苗啃食得精光。

家人

晨雾未散，国防科技大学家属区的一扇窗早早亮起了灯。

这一天，又是该校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戟出差的日子。没多久，母亲刘桂枝推着他的轮椅，缓缓穿过楼道。

轮椅碾过地面的声音，在一片寂静中显得格外清晰。王戟察觉到母亲沉默里藏着的心疼，轻声说：“妈，不要这样。我总是要面对嘛。我感觉很充实，这不是很好吗？”

刘桂枝点点头，把儿子送上了车，目送车子消失在拐弯处。

她这一生，不知多少次目送儿子出发。从前是送他上学、去实验室，如今是送他出差、开会；从前他大步流星，如今他坐在轮椅上。但在刘桂枝眼里，儿子奔赴的方向从未变过。

从不满 14 岁考入原国防科学技术大学，到 33 岁被评为教授，再到身患重疾却愈挫愈勇……一路走来，旁人看到的是履历上耀眼的荣誉，母亲看到的，却是儿子身上越积越深的伤痕，以及他心中从未熄灭的那团火。

王戟小时候，在母亲工作的机械厂里是出了名的“调皮鬼”，还没入学，他就被老师列入“重点观察名单”。面对老师的犹疑，刘桂枝不慌不乱，带着儿子上门向老师郑重保证：“王戟是调皮，但他上学后一定会改，因为他爱学习。”

刘桂枝心里有底。那时她是厂里夜校的数学老师，有时去上课，会把王戟带上。几堂课下来，她发现这个平日里在家属区闹得鸡飞狗跳的“孩子王”，一进课堂就收了心，坐得端端正正，双眼紧盯黑板，听得比有些成年工人还认真。回到家，王戟还拿起筷子当教鞭，对着墙壁念念有词地“讲课”。

刘桂枝意识到，儿子身上藏着一颗求知的心。有一天，她郑重地问儿子：“人身上什么东西别人拿不走？”王戟猜了几样，都被妈妈摇头否定了。末了，刘桂枝轻轻点了点王戟的小脑袋，说：

念 亲 恩

父亲离世已经 30 个年头了，每次想起他，眼前都会浮现出他生前爱不释手的旱烟杆。

父亲的旱烟杆，由家乡盛产的毛竹做成，大约一尺长，因长年的烟熏火燎，整根旱烟杆都变成了暗红色。

记得我小时候听父亲与人说起过，他是在抗美援朝战场上学会抽旱烟的。

父亲 1949 年参军，1950 年随部队入朝参战。第一次参加战斗，面对敌人飞机大炮的轰炸，看到一个个战友在身边倒下，还是一个新兵的父亲难免紧张恐惧，还是一个新兵的父亲难免紧张恐惧。在战斗间隙，连队一名参加过解放战争、来自东北的炊事班班长坐到他的身边，把已经点燃的旱烟杆递给父亲，笑着说：“抽一口就不紧张了。”父亲回忆说，当时战事紧急，根本没有烟叶，老班长烟斗里填的是干树叶。父亲就是从抽老班长的第一口干树叶开始，学会了抽旱烟。

从那以后，每一次战斗间隙，父亲都会在老班长陪伴下抽上几口干树叶，以此缓解高度紧张的神经。父亲也在老班长和旱烟杆的陪伴下，成为一名英



以继续报国的天地，比什么都强。

王戟没有辜负母亲的期望。待身体稍有起色，他便迫切要求重返岗位。那时，他心心念念推进的高可信软件技术研究，正处于关键的爬坡阶段，许多核心课题等着他去解决。为此，学校专门为王戟安排了一套一楼的小公寓，门前的马路、楼门乃至家门，都进行了无障碍改造。

重返岗位后，王戟以惊人的毅力投入工作。2015 年，他主动担任某重点国防项目技术首席专家。此后数年，他坐着轮椅奔波于全国各地的论证会、评审会，最忙时一周辗转 3 座城市。

然而，命运的考验并未终止。2021 年，因肾衰竭，他开始接受每周 3 次、每次 4 小时的血液透析。

透析室里，仪器嗡嗡作响。王戟半靠在床头，右手扎着针管，左手拿着手机看论文，有时候还开着视频会议。手臂上因常年针刺留下的褐色瘢痕清晰可见。

医护人员说，从没见过边透析边工作的人。王戟却跟身边的人开玩笑：“每周 3 次透析，就是我的‘休息日’。”知情人都知道，这些“休息日”，他几乎没有真正休息过。只要透析结束，他照常赶回实验室或会场，仿佛那 4 个小时不过是日程表上一段寻常的注脚。

2025 年 1 月，王戟牵头负责的某重点国防项目孵化成果荣获军事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这些年来，王戟带领团队研发的软件技术，应用于航空航天、重大武器装备等领域。他所在的集体，有一个响亮名字：“银河人”。

天上的银河，由无数星辰汇聚而成；地上的“银河”，同样由一代代科研人的智慧与心血凝聚而成。王戟是其中一颗星。他的光，来自母亲的托举，来自妻女的支撑，也来自整个团队的合作——就像母亲当年说的“大家都会帮你”。

寒来暑往，王戟的轮椅碾过校园的道路。轮椅上的他继续在科研的疆场冲锋。那些由他和团队一行一行写下的代码，护卫着大国重器平稳运行，无声，却有力。

1990 年，我入伍后第一次回家探亲。我用攒下的津贴和稿费，买了两条香烟拿到父亲面前，劝父亲不要再抽旱烟了，抽好一点的香烟。父亲把我递过去的香烟轻轻推到一边，说香烟太贵，还是抽旱烟带劲。我没有再劝。那时我已经理解，父亲手中的旱烟杆，承载着他的人生，还有他过去的记忆。

1996 年底，我正在北京出差，父亲病危的电报发到了单位。当我赶回家中，父亲已经离世。看到床上冰冷的父亲，还有搁在床头柜上冰冷的旱烟杆，我心如刀绞！

多少年过去了，父亲的旱烟杆，依然时时浮现在我的心头。无论我在什么岗位，或是面临怎样的复杂问题，每想起父亲的教诲，我都会心生底气，步伐更加稳健，同时也更加真切感受到肩上承担的重量。

家庭秀

爸爸的绿军装
还带着停机坪上翻滚的热浪
小小的战机模型
被托在他宽厚的手掌
我伸手抚过机身冷硬的线条
听爸爸讲述
飞鲨刺破晨雾乘风破浪出征的模样
妈妈静坐在身旁
温柔守望我们相伴的时光
将生活的辛劳悄悄珍藏
把绵长的期盼缓缓安放

赵 楠 配文

定 格 近日，海军航空大学某部干部张浩然的妻女来队探亲。图为张浩然在营区文化活动中中心图书室陪伴家人。

姜 涛 摄

两情相悦

夜色笼罩戈壁，最后一抹霞光被远山吞没，营区里只剩风声。宿舍内，结束了一天训练的张龙龙拨通了妻子黄靖雯的视频通话。屏幕那头，黄靖雯坐在钢琴前，眉眼含笑，语气轻柔：“刚给学生排完一段曲子，弹给你听听。”

话音刚落，琴音便从手机里传出来。他下意识放轻了呼吸，指尖也不自觉地跟着旋律轻轻打着节拍，思绪被悄然拉回那个与妻子初识的夏天。

他们的相识，始于大学里的一场不期而遇。当时，张龙龙与黄靖雯都是音乐学院的学生，张龙龙王修钢琴，黄靖雯专攻声乐，琴房便是两人常驻足的地方。

一个午后，阳光穿过百叶窗，在琴键上洒下斑驳的光影。张龙龙正反复打磨一首钢琴伴奏曲，指尖起落间，旋律时而低回婉转，时而铿锵有力，但在一处乐句转折时，他始终拿捏不准力度。

“这里的和弦，不再柔和一点。”声音从门口传来，黄靖雯抱着乐谱，眉眼间带着浅浅歉意：“我刚好路过，听到你弹这首曲子，觉得这里的情感还能再细腻些。”

张龙龙听后，有些腼腆地起身让出琴凳，邀她一试。黄靖雯缓步向前，指尖落在琴键。同样的乐谱经她演绎，多了几分灵动，旋律有了恰到好处温柔。

从那以后，他们常在琴房见面，一同推敲乐谱，打磨演唱与弹奏的细节。大多数时候是张龙龙抚琴伴奏，黄靖雯轻声歌唱。琴音与歌声交织，心底的情愫也在朝夕相处中悄然生长。

一个星光清朗的夜晚，张龙龙弹完一曲，抬头望向黄靖雯，认真地说：“以后，我想一直为你伴奏。”黄靖雯眉眼温柔，昔日同窗与并肩的战友齐聚。一架钢琴静静安放在舞台一侧，给婚礼增添了几分独属于他们的郑重与浪漫。

那时的他们和所有年轻恋人一样，以为日子会像琴房里的旋律一样悠长。直到毕业季来临，现实给两人出了一道严峻的选择题。

在校期间，张龙龙在中国古代音乐史课上，常被那些藏在曲谱里的家国情怀所触动。戍边将士月下思乡的曲调、边塞诗歌中苍茫辽阔的意象，勾起了他自幼埋在心底对军营的向往。

思虑良久，张龙龙把参军的想法说给黄靖雯听。他比谁都清楚，奔赴军营不只是实现梦想，还意味着两人要相隔千里，忍受漫长的分离。说话时，他不敢看她的眼睛，怕看见难掩的失落。可黄靖雯只是安静地听完，轻声说：“不管你去哪里，一定要照顾好自己。”

不久后，张龙龙如愿参军入伍，奔赴边疆军营；黄靖雯则回到家乡，成为一名中学音乐老师。分别那天，黄靖雯没有落泪，只是轻声唱起两人一同排练过的曲目。歌声里满是不舍，更透着坚定的支持：“我在这里，等你回来。”

从此，两人相隔千里。一边是边关

战 友

■王建辉

岁月有情

1996 年 8 月，西安持续的高温似乎要把这座古城烤出“油”来。一天，我接到父亲老战友何雨农的儿子何家明从成都打来的电话。他告诉我，他父亲已于昨日去世了。“何伯伯去世了？”这突如其来的噩耗让我愕然，一时间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记忆的“闸门”也随之打开。

在我父母几十年的军旅生涯中，何伯伯是他们最亲密的战友。从我记事起，就常听父母说起他们与何伯伯的情谊。我父亲是四川北川人，何伯伯是四川茂县人，二人同为羌族。1935 年春天，他们先后参加了红军。当时，他二人刚满 19 岁，正值青春年少，共同的理想信念让他们很快成为亲如兄弟的战友。全面抗战开始后，父亲和战友经常组织民兵和群众，在晋中榆次一带破环日寇的铁路。他们将敌人的铁轨扒下来后，运回我兵工厂。何伯伯则奉命带领小分队用了近一年的时间爬遍了太行山，把晋冀豫三省之间的地图绘制完整。

父亲生前说，在那烽火连天的抗战年代，每当他与何伯伯圆满完成上级布置的任务后，二人都会挤出时间进行交流，相互倾诉完成任务的喜悦。父亲说，那时环境异常残酷，他们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心中只有报效国家，早日驱除日寇。

1942 年，父亲与在原太行军区 4 分区医院工作、后来成为我母亲的徐树英相识。第二年春天，何伯伯得知我父亲即将成婚的消息后，将自己积攒的两块银圆给了他。父亲说，他就是用这两块银圆置办了家什，和我母亲办了喜事。

20 世纪 70 年代，我在部队服役的二哥王建中执行任务时不幸牺牲。消息传来，我们全家人顿时陷入巨大的悲痛之中。当时在原成都军区工作的何伯伯知

边关恋歌

■张坤堂 卫怡博

军营，一边是三尺讲台，思念成了他们的日常，音乐便是彼此之间温暖的纽带。张龙龙在训练间隙，总会掏出随身携带的口琴，吹起熟悉的旋律。黄靖雯扎根校园，备课授课，带着孩子们歌唱，把对音乐的热爱传递给学生。闲暇时，她会录下自己的演唱视频，发给张龙龙看，曲调中藏着绵长的牵挂。

2025 年底，两人终于跨过千里山河，携手步入婚姻殿堂。现场灯光柔柔洒落，昔日的同窗与并肩的战友齐聚。一架钢琴静静安放在舞台一侧，给婚礼增添了几分独属于他们的郑重与浪漫。

身着军装的张龙龙身姿挺拔，端坐于钢琴前。旋律缓缓流淌，黄靖雯身披白纱款款走来。一曲终了，黄靖雯眼底的笑意与泪光一同闪烁。张龙龙抬手，轻轻拂去黄靖雯鬓边散落的碎发，在她耳畔轻声许诺：“往后余生，我将一直为你伴奏。”

婚后，每次来队探亲，黄靖雯都会积极参与张龙龙所在单位组织的联谊活动，为官兵倾情献唱。

不久前，单位筹备文艺汇演，张龙龙第一时间便想和妻子一同登台，把两人藏在音符里的思念与坚守，留给战友听。排练现场，前奏缓缓响起。黄靖雯看着眼前晒得黝黑，身姿却愈发挺拔的丈夫，满眼都是心疼。她清楚边关训练的艰辛，也更懂得，这份并肩而立的团圆，有多么来之不易。

文艺汇演如期而至。聚光灯下，黄靖雯与张龙龙站在属于他们的舞台上。戈壁的风沙阻隔不了歌声，遥远的距离也拆不散相伴的身影。

战 友

道我二哥牺牲的消息后，第一时间给我父母写了信，情真意切的话语给了我父母不少慰藉。那时父亲因悲伤过度，心脏出现间题无法出门，只得由母亲带着我们兄妹四人去二哥生前所在部队处理后事。

我们返程时途经成都，何伯伯与老伴陈阿姨早早来到机场等候。一见到我们，何伯伯便快步迎了过来。他伸出双手紧紧握住我母亲的手。在部队处理二哥身后事时强忍悲伤的母亲，此时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哽咽着对何伯伯说：“老何啊，建中牺牲了……”说完，便失声痛哭起来。

停顿片刻，何伯伯动情地对我母亲说：“树英，不要难过。建中没有给我们这些老兵丢脸，他不愧是红军的后代。作为一名军人，他死得其所。我身为一名老战士，为他感到骄傲。”去停车场的路上，何伯伯一直陪伴我母亲走在前面，如同他们当年一起出征的模样。多年之后，每当我回忆起初时的情景，依然感到，何伯伯对我母亲说的那句发自肺腑的话，给人力量，让人振作，使人坚强。

我们在成都的那几天，何伯伯有几次把我们几个晚辈叫到身边，给我们讲抗战时期他与我父亲等人如何在残酷的环境里毫不退缩，勇敢消灭敌人的故事。他还讲了我母亲虽然出身贫苦，文化程度不高，但她参加革命后不甘落后，认真学习，很快成为部队医院里一名出色的医护人员。何伯伯的讲述深深吸引着我们。现在想来，那情景就像发生在昨天。

今年，何伯伯已离开我们 30 年了，我父母也已故去多年。这些年，我时常想起何伯伯与我父亲结下结的深深战友情谊。他们为了心中的理想信念，为党和人民的事业默默奉献的精神一直熏陶并影响着我。他们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